

多问与多疑

俞晓群

的境地。

其实历代贤哲重视问书，甚至有胜于读书本身。列几段经典语录:《尚书》:“好问则裕。”董仲舒《春秋繁露》:“君子不隐其短，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刘向《说苑》:“君子不羞学，不羞问。问学者，知之本，念虑者，知之道也。”王符《潜夫论》:“博学多识，疑则思问。”张载《经学理窟》:“有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陆九渊《语录》:“为学患不疑，疑则有进。”李贽《温陵文集》:“学人不疑，是为大病。”魏禧《魏叔子文集》:“人不学，不知困；不疑，不能悟。”汪烜《清儒学案小识》:“读书不会疑，便是不会读；疑而不能悟，亦是不会读，总是未尝用心去求得之病。”

古人读书献疑，最重要的原则为“实事求是”。此语出自《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评价：“实事求是，四字是读书穷理之要。”龚自珍《与江子屏笺》进一步说：“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

此处，说一段刘德的题外故事：刘德收集善书不惜重金，民间藏家都信服他的美德，纷纷奉上私藏，甚至把先祖的旧书拿出来。因此刘德拥书之巨，“与汉朝等”。当时淮南王刘安也好书，但“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民间有“献书王”之誉。

读书献疑，有了实事求是，还要有三个不能：

一是不能唯古是尊，如方孝孺《辨疑箴》：“不善学之人，不能有疑，谓古皆是，曲为之辞。”魏禧《杂问引》：“语曰：信而好古，读古人文，不疑不足以信古也。予不敢废已所疑以信古人，尤不敢自信其疑。”有名的故事，见洪榜《戴先生形状》：戴震年幼时读《大学章句》，问老师：“此何以知之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老师答：“此先孺子朱子所注云。”问：“子朱子何时人也？”答：“南宋。”问：“孔子曾子何时人也？”答：“东周。”问：“宋去周几何时矣？”答：“几二千年矣。”问：“然则子朱子何以知其然？”老师无法回答了。

有称戴震之问为幼童之思，或曰学者之思的初蒙；那么史上还有“帝王之思”，可供欣赏。清圣祖即康熙帝有《庭训格言》写道：“凡看书不为书所愚始善。即如董子所云：‘风不鸣条，雨不破块，谓之升平世界。’果使风不鸣条，则万物何以鼓动发生？雨不破块，则田亩如何耕作布种？以此观之，俱系粉饰空文而已。似此者，皆不可信以为真也。”

二是不能唯师是尊，如陆九渊《语录》：“孔门如子贡即无所疑，所以不至于道。孔子曰：‘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歟？’子贡曰：‘然。’往往孔子未然之。孔子复有非与之间，颜子仰之弥高，未由也已，其疑非细，甚不自安，所以殆庶几乎！”他是说，在孔子的门生中，子贡因为不善于提出疑问，所以不能抵达先王之道；颜子

恰恰相反，所以他近乎成为贤德之人。

三是不能唯己是尊，也就是说，学习不能自以为是，闭门造车。如《尚书·仲虺之诰》：“自用则小。”《礼记·学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颜之推《家训勉学》中，更是强调“切磋”二字，反对师心自是：“盖须切磋，相起明也。见有闭门读书，师心自是，稠人广坐，谬误羞惭者多矣。”

读书时疑问很多，但“疑”也要讲求方法，其要点如：

其一，针对性。如上文谈到，晁错批评太子读书方法有误。那么身为皇太子，他首先需要“疑问”什么呢？晁错列出四项内容：“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为此晁错受到皇上的赞扬，拜为太子家令，他也被太子家尊称为“智囊”。

其二，信古与疑古之争，由来已久。远在宋代，如冯班《钝吟杂录》所言：“夫子曰：‘信而好古。’宋人读书，未闻好古，只是一肚皮的不信。”但无论信或疑，都要以敬畏之心作为基础。魏禧《里言》说：“读古人文，好附和、翻驳，皆病也。能以敬畏古人之心而披其疵，则几矣。”讲的是一味附和或全面否定，都不是好的做法；而以敬畏之心提出问题，才是可取的学习态度。

梁启超先生讲学，最提倡怀疑精神，所有的研究方法，诸如发

生问题、收集资料、鉴别资料、整理资料、判断问题等，都要以“怀疑”二字为引导，不能为古是从。他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引先哲言曰：“故见自封，学者之大患。”接着又举例：“天圆地方”不是问题，到哥白尼却成了问题；“人为万物之灵”不是问题，到达尔文却成了问题；“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不是问题，到戴东原却成了问题；苹果落地、开水掀壶盖不是问题，到牛顿、瓦特却成了问题；《古文尚书》《太极图》不是问题，到阎百诗、胡朏明却成了问题。

再者读名著，梁氏也有客观判断，值得记忆：其一，万斯大《周官辨非》、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胡渭《易图明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崔适《史记探源》，这几部书发现问题何等大胆，判断问题却有不甚谦谨之处，不可学；其二，赵翼《廿二史劄记》、俞正燮《癸巳类稿》、陈澧《东塾读书记》，他们对于资料之收集整理何等辛勤；其三，王引之《经传释词》《经义述闻》、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看他们怎样驾驭资料，且所下判断何等谨慎。

由此想到，章炳麟先生也有一段品评古书的文字，笔法与梁氏类同，见识也不得了。见《华国月刊》中学国文书目，其中谈到：“唐李德裕谓其家不蓄《文选》，恶其浮华，语虽过激，于今日则正为针砭……文史诸书，如《史通》《文史通义》等，今亦不采者，所求乎学子，在其深造以致远，不欲其语高而长傲也。”

书单

七十年，七个故事

国庆期间，不管你是一宅到底过的，还是呼朋引类聚一聚过的，又或是无惧人潮踏入了景区，读书肯定少不了的。有句鸡汤咋说来着，你读过的书和走过的路都藏在你的气质和长相里。长得不好，就别总想着去整容！多读书，花钱少，还没有后遗症。

秋色弥漫的日子里，适合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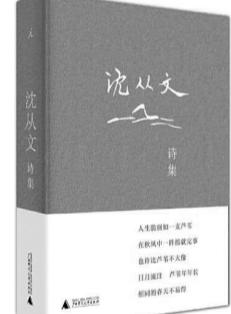
《我和我的祖国》

开国大典、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女排夺冠、香港回归、2008年北京奥运会、神舟飞船载人航天以及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阅兵仪式，本书选取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民记忆深刻七个历史事件为切入点，通过七位导演的艺术创作，以普通人的视角讲述了个人与国家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动人故事，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表达了炎黄子孙深切的爱国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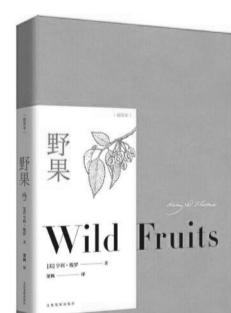
《一寸光阴不可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榜样，无论我们培养和树立了多少精神榜样，季羡林先生始终不应该被忘记，不应随时光的流逝而褪色。对于当下的孩子而言，季羡林先生是谁？有着怎样令人钦佩、值得学习的事迹？透过本书，季老一生跃然笔下，孩子们能清晰地看到他的人生成长轨迹、奋斗经历、一生成就。



《沈从文诗集》

很多人知道沈从文写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样动人的情书，却很少有人知道，沈从文还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个边城少年时，他写了许多诗给一位白脸长身的女孩子。到了晚年，困于重病，不能做事的孤寂长日里，写诗是他找到的唯一还能做的事。



《野果》

本书是梭罗在人生最后十余年中，观察故乡康科德镇乡村田野间多种植物的笔记。与《瓦尔登湖》中的哲人不同，在本书中，梭罗就像一位植物学老师，他满怀对大自然的神圣挚爱，以其仔细考察野外行程为线索，娓娓动听地详细描述了各类野果在北美地区的分布状况，回顾大地上种种果实的来历，讲述它们与人类互动的故事，有偏爱而无遗漏。从果实到阳光、风和树林，从定期泛滥的河流到种子在大地上的传播，梭罗用一贯的自然之眼，观照着人们的生活。

与现实相见而不相亲

苏妮娜

刁斗是一位创作很用力的作家，他的创作成果令人瞩目，我在高中订阅的报纸《作家文摘》上读到他时，万不敢想这个昔年印象中酷酷的大作家，有一天会成为我的同事。然而现在的我才明白一件事，不管写了多少，不管姿态上多么狂野，事实上，他是不惮于一直在写现实、写生活的作家，是一个村上春树那样日复一日地劳作、把写作职业化的作者。我是说，他有我们每天上班一样细水长流的耐心。尤其是，发现他出身先锋那一拨作家，他却并没有像他的同期好友马原出道时候那样醉心于形式便善罢甘休。我注意到，谈论刁斗的评论家们，往往从他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入手。如同吴义勤说：“总的说来，刁斗一直是一个对当下生活保持着高度敏感的作家，他的小说总是散发着现实生活体温，并敏锐地触及着当下的生存之痛和精神之痛。”这似乎把刁斗习惯的以现实为基准的写作方式直接定位为了“写现实”。现实与用力这两者相加并没有使他变成一个我们通常所说的深深具备现

实主义力量的作者，他不像贾平凹那样追求“立一块牌子”的写作，也没想过“一句顶一万句”。他对现实的这种用力与他小说中对于现实“生活”不那么用力的人物和故事形成了一种反差。某种程度上，他是快意的，另外一定程度上，他是回避的，他与现实时时相见却又不相亲。

我们应该意识到，写现实不见得写下的都是同一种现实，即便是，也可以使用不同的态度。现实感只是作者引导读者进入故事的一个策略，现实是“被征用的”，从这个普通人都可以进入的入口，人们有可能到达哪里，这才是一个问题。他写情感和欲望化的现实，故意寻找着现实对于内在的摩擦和挤压，那痛、痒、尴尬。他写出来的既是现实，也是对现实的背离和逃避，至少也是“溜号”。他的小说人物不是太多，似乎执意以“我”和“我哥”“我爸”等人为主，还动不动就把小说中偶尔过场的人物行为交给我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某人——譬如，给《我哥刁斗年表》中“我”的侄女刁婵做翻译的朋友，叫霍长

和，那就是我的同事中的前辈。还有，《发现》这一文集中的第一篇《小说》原野、孙慧芬都悉数登场。小说地点延伸也不太远，采用沈阳本地真实地名的时候极多，而即便虚构地点，也是反复使用，并且虚构地点与实际地点混搭，不了解的人根本看不出来；张集，就是依托实行的城市沈阳、隔着不远的距离、“搭建”于郊区的叙事场地。有段时间，他还专门为这个地点的存在写了两个短篇，一为《去张集》，一为《张集行》。《去张集》在虚实之间衍生出一场“不知所起”又无由而终的情爱。这么说起来，刁斗就不仅仅是“深入”现实了，他既是“亲和”现实的，也试图“重组”现实，搞不好他就是在“调戏”现实，把对现实观察的那个点埋藏在嬉戏性的描写背后。

他的不合群某种程度上是现代性的书写所决定的：执念从一个坚固的自我出发，去瞄准现实，因此，对于现实，既不是趋上前去，也不是转身离开。用手中之笔瞄准现实，这样，进可以穿透其内部，退可

以取其大概轮廓做一个故事的背景。瞄和射这两个动作就是刁斗的两种写作状态，于这两种状态之间的切换给予刁斗创作的自由和快乐。刁斗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他自己这座炮楼上唯一的战士，趴在一根叫作写作的机关枪后边，偶尔荷枪实弹，更多是瞄而不发。我个人认为，瞄比发更有意思。瞄是不做定论的动态的过程，瞄是固执地收集这个观察点能看到的有限景观。不确定和有限性，是现代小说提供的观察现实与解析经验的方式，它们促使小说放弃认识世界客观性的硬性使命，还给写作者作为观察者的淡定和乐趣。刁斗对于现实的这种弹性、有张弛的把握，在于他对自我内心的踞守。本雅明有个精彩的判断，叫作“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可以印证于刁斗的全部写作。他其实是有意识地在保持孤独，因为孤独就意味着距离，距离才能保证观察的有效性——用精神性的操作有效地处理现实，这是我们这些读者在一个不是文学的时代仍然期待文学的理由。

走进江晓原的科学世界

宁彦峰

以前，我们认
为科学尽善尽美，
所
以
要
热
爱
科
学。江晓原有一个
比喻：科学好比厨房里的菜刀，既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在《江晓原科学读本》中“菜刀”的提法，能够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的工具意义，要对科学有戒心，把它放在和其他知识平等的地位。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江晓原建构了一种“更科学”的科学观。他把科学请下神坛的同时，又在其中注入了人文的清醒剂，于当下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大有裨益。

喜欢江晓原的文章，始于《科学外史》。其中的江晓原如一名时光使者，晓天地，通古今。但真正走进江晓原的科学世界，是在《江晓原科学读本》(以下简称《读本》)。在这里，江晓原回归教授之职，提纲挈领地总结被他融入大千世界各个角落的“科学”认识，成为六册浅蓝色小书。它们各司其职，勠力同心，一起喊出一种新的科学观。

开宗明义，江晓原将科学精神归纳为三要素：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平等和宽容精神。其中，理性精神是指要用物质世界自身来

解释物质世界，不能借助“神力”；实证精神是指理论必须被可重复的实验证明；平等和宽容精神是指允许别人发表和保留不同意见。我认为，前两点，是我们判断一个人或一种理论是否“科学”的基本要求，第三点却是江晓原超越“科学教授”身份的创见，是关于科学精神的“增量”。试想，如果连争辩和质疑的权利都没有，科学的车轮只能在历史的跑道上原地打转。

鉴于科学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在科学的身后，常常有三种追随者。他们都喜欢一个共同的称谓——“爱”科学。一是膜拜者，他们慑服于科学所取得的辉煌胜利，以及这些胜利影响文明的进程，从而相信科学无所不能；二是对话者，他们平视科学，阅读科学元典，与牛顿、爱因斯坦、霍金这些大师对话，对科学尊重而不迷信；三是旁观者，他们试图与科学保持一定距离，站在历史的和哲学的山坡上审视科学，不断总结科学的发展与成长规律。在《读本》中，江晓原反对“膜拜者”，偏爱“对话者”，乐见“旁观者”。《读本》对我的启发是，如果是“真爱”，那你就与科学平等相处吧！

在生活语境中，我们常常将科学与正确画等号。但江晓原认为，“科学”只是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建构的一种“模型”。没有哪一种模型永远正确。今天被认为“正确”的模型，随时都可能被“更正确”的模型取代。科学就是沿着“正确——不正确”的阶梯不

会科学，特别是哲学，连排在科学最底端的学科都比不上。江晓原认为，“科学鄙视链”不宜提倡，但它潜藏于科学家的意识之中，常常会有表达的冲动。物理鄙视链背后的逻辑是对数学工具的应用程度。用这把尺来量，物理最“硬”，生物学只能算“凑合”，经济学就不值一提了。

在《读本》中，江晓原有一个比喻：科学好比厨房里的菜刀，既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江晓原对这一比喻颇为满意，他说：“我一直寻找合适的比喻来形容科学，曾经用过‘交际花’等，最后发现‘菜刀’最合适。因为菜刀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而且具有两面性。以前，我们认为科学尽善尽美，所以要热爱科学，为科学献身。”菜刀”的提法，能够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的工具意义，它是为人类服务的。我们要对科学有戒心，把它放在和其他知识平等的地位。这样，我们才能客观理性地看待科学争议。

如何让科学把“菜刀”尽量多地为人类做好事，而尽量少地做坏事？江晓原开辟了一个新视角，让科学找到了对立统一的另一面——人文。科学与人文是两种文化，它们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主要的表现形式，已经从轻视科学与捍卫科学之间的斗争，从保守势力与改革开放的对立，向单纯科学立场与新兴的人文立场之间的张力的转变。正是由于人文主义的出现，科学主义者才遇到了真正的对手。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常常互相攻击，且各有所长。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人文也一样，双方各有各的局限性。《读本》启发我们：科学与人文，虽然不一定相亲相爱，但却必须平起平坐，共同滋养人类文明的进程。

《读本》用全新的视角看科学，向大众传播新的科学理念。江晓原认为，在过去某一段时间里“读本”很热，但后来慢慢又“冷”了。原因是这些读本还是以“科学普及”为基本立场，对科学顶礼膜拜。大部分内容毫无新意，或者是作为教材的补充，单纯讲述科学知识，或者是直接用牛顿等人的原著，使得读者很难理解。对于科学与大众的关系，江晓原的立场是“科学传播”。《读本》首先科学家试图与大众对话的重要文章。因为，它们代表了科学界对公众的回应，是大众最应该知晓的“科学硬核”。这些“硬核”如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霍金的《公众的科学观》、薛定谔的《科学思想泛论》。由于“科学传播”的基本立场，《读本》的本意也显得出类拔萃：首先，它是面向公众的，意在让读者亲近大师、探寻科学的本质；其次，重点关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尽力拓宽读者的科学视野。

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江晓原建构了一种“更科学”的科学观。他把科学请下神坛的同时，又在其中注入了人文的清醒剂，于当下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大有裨益。